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研究 丛书

许毅 / 主编

西方财政 理论研究

陈宝森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 许 毅 主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研究》丛书

西方财政理论研究

陈宝森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财政理论研究 / 陈宝森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5058-5246-9

I. 西… II. 陈… III. 财政-经济理论-研究-西方国家 IV. F8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5668 号

目 录

第一章 前 言	(1)
第二章 重商主义财经理论盛行时期	(6)
第一节 历史背景	(7)
第二节 重商主义财政经济理论	(24)
第三节 对重商主义财经理论的点评	(32)
第三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盛行时期	(38)
第一节 历史背景	(38)
第二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经理论	(58)
第三节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财经理论的点评	(69)
第四节 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各流派评介	(76)
第四章 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	(125)
第一节 历史背景	(125)
第二节 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学派财经理论	(137)
第三节 马斯格雷夫的当代西方财政学评介	(149)

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财政经济理论的兴起	(182)
第一节	历史背景	(182)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财经理论	(188)
第三节	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公共选择论	(193)
第六章	科学对待西方财政理论	(233)
第一节	在基础理论上西方财经理论同 马克思主义的差别	(233)
第二节	与国际接轨和向西方市场经济取经	(273)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财政理论	(274)

第一章

前言

中国财政理论界面临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有两个前提：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总结我国建国以来财政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探索中国特色财政的运动规律；二是科学地对待西方财政学，吸收其精华，摒弃其糟粕，洋为中用。

历史地考察西方财政学，人们会发现，在早期独立的财政学著作是比较少的。它同经济学很难截然分开。这是因为财政与经济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从理论上说财政作为国家实行再分配的工具，它一头连着国家这个上层建筑，另一头通过再分配又连着经济基础。但是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它总是占统治地位那个阶级的国家。所以作为执行国家职能的财政必须反映经济基础的需要。也就是占统治地位那个阶级的需要。所以不同时期的财政思想总是不同时期占统治地位那个阶级需要的反映，或者在社会变革时期则反映新兴阶级对经济基础变革的需要。这就决定我们在阐述西方财政理论时不可能不与西方经济理论紧密挂钩，而且必须是由经济理论到财政理论而不是相反。

西方财政理论同经济理论一样，是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

展而不断演进的。西方财政理论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重商主义财经理论盛行时期；第二，古典政治经济学财经理论盛行时期；第三，凯恩斯主义财经理论盛行时期；第四，新自由主义财经理论盛行时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两次资本主义危机成为促进西方财政理论发展的触媒，这就是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膨胀”。是为了解救大危机，把赤字财政抬上了历史舞台，而财政政策的失误则是引发“停滞膨胀”的重要背景。当然把西方财政理论分为四个阶段来谈，并不是说各个理论之间没有继承性和连续性，而是为了突出不同历史时期财政理论的阶级本质和时代特征。

如果从15世纪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算起，重商主义大约盛行了300年。重商主义是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理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胚胎。重商主义的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保护主义关税，现代税收制度，国债制度，标志着这一时期的财政理念。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工业资本的发展成熟而站稳脚跟，这种理论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古典经济学财政理念盛行了200多年，历经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始终居于财政经济理论的统治地位。随着垄断资本激化了劳资矛盾，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缓和社会紧张的财政主张已经出现，不过古典理论尚未遭到动摇。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大萧条，凯恩斯主义登上舞台，古典理论才受到了严重挑战。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在李嘉图时代达到了顶峰，并且形成了小政府低税收的财政理论框架。1830年以后，由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加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对资本主义发起了凌厉攻势，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或者在宣扬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力求阉割其科学内容，或者

抛弃劳动价值学说，另起炉灶，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形成了后古典财经理论的各种新流派。

凯恩斯主义崛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此时，垄断资本主义所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需要国家这个上层建筑发挥反作用，以稳定其经济基础，而由国家掌握的财政金融工具恰好可以充当这种稳定器和平衡杠杆。于是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自此，西方国家先后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也就此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灵魂，并被歌颂为“凯恩斯革命”，到 60 年代已为西方统治阶级所普遍信奉。凯恩斯主义以赤字财政为标杆，但它是宏观经济学而不是财政学。是马斯格雷夫等人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引下，在美国建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学。他把财政的职能由资源配置扩大到了调节收入和稳定经济等三大领域。赤字财政政策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的美国，被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总统们发挥到极致，大炮和牛油并举，破坏了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国民经济出现“停滞膨胀”的尴尬局面，就此砸了凯恩斯主义的牌子。

在这以后是一个打破垄断、百家争鸣的新时期。其中与财政税收有直接关系的经济理论在美国是以拉弗曲线为代表的“供应学派”，间接相关的有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货币学派”及卢卡斯所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在英国则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撒切尔主义”等等。这些学派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共性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他们捡起萨伊“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老招牌，反对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主张私有化和放松管理并削减联邦福利支出。其实践结果是消除了某些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负面影响，却没有从根本上摧毁政府的宏观调节和社会安全网。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这些派别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有人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派。在财政学领域代表“新自由主义”

的，是由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主张恢复财政谨慎原理，并要求对政治权力进行宪法约束。1986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奖，他的代表作《民主财政论》受到称颂。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上是对立的两派，这种对立恰好是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同新自由主义两军对垒的缩影。

20世纪90年代，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新时期。以西方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垄断资本，积极从事全球扩张。他们需要一种能够推广于全球并反映其自身利益和诉求的经济纲领。1990年，在美国政府、研究机构和国际经济组织共同倡导下，在美国首都举行了一次研讨会，通过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财政经济思想在这个宣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一度成为拉丁美洲国家和某些欧洲转型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时自愿采纳或被迫执行的方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华盛顿共识》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理想的结果。

在美国本土，20世纪90年代是新民主党人掌权的时代。以克林顿为代表的新民主党人不再高举凯恩斯的旗帜，也不苟同于“新自由主义”，而是介于两者之间，采取某些中性立场。他们强调财政纪律，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但不反对政府干预，不过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不应再是用财政金融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而是要政府把投资用于教育和技术创新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卢卡斯和保罗·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新民主党的理论表现。

进入新世纪，在美国，白宫宝座易手，共和党重新执政，布什政府在经济理念上同“新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没有打出“供应学派”的旗帜，但实际执行的是与里根政府相同的减税政策。然而在经济衰退和复苏疲软的重压下，他们并没有执迷于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而是公然宣布要用减税刺激经济，这是不同于老共和党人传统的。在布什蝉联总统宝座后，他

进一步提出打造“业主社会”、对所得税制和社会保障实施大手术的主张，保守倾向更加明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财政、经济理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为经济基础服务，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则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理论从来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不弄清历史背景，就不知道一种理论为什么会产生，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在一定时期会居于统治地位，而又为什么会走向衰微，乃至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本书在讨论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同时，拿出一定篇幅，描述了各种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目的是把理论还原到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去，以加深对这种理论的理解。在谈历史背景时着重于三个方面：其一，该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其二，与此相应，该时期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其三，适应这些变化，在财政税收制度上的变化。

第二章

重商主义财经理论盛行时期

在讨论西方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史时，我国学者一般都把重商主义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评介，而在讨论财政理论和思想发展史时，这部分却往往付之阙如。因为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才是资产阶级财经理论的发端。这虽不无道理，但不免有其偏颇之处。比如说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在财政方面，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关税，主张小政府、低税收，反对大政府、高税收。这些都是作为重商主义的对立面，为了适应工业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提出的。但是，工业资本没有原始积累是发展不起来的，重商主义的作用，正是为工业资本进行原始积累服务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前提。重商主义的财政理论，如保护关税，发行国债，税制变革等等，在原始积累上都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工业资本主义才有发展起来的可能。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不是因为重商主义在它曾经存在的那个历史时期是错误的，而是说到了工业资本成长壮大之后，它已变得不合时宜。亚当·斯密当然不会直接这样说，但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因此，重商主义财经理论，尽管它还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应当被看做是整个资产阶级财

经理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从原始积累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国际垄断资本这个全过程，财政理论如何发展、如何变化的一个完整画面。

第一节 历史背景

一、向自由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状况

(一) 商业资本和原始积累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之前，有一个商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家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原始积累的时期。原始积累有两个历史任务：第一，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使之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逼迫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走进资本主义工厂；第二，积攒开办工厂、矿山等资本主义企业所必需的大量货币财富。商业资本家在这个过程同时起过上述两种历史作用。

在说到原始积累时，人们很容易想起“羊吃人”的故事。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英国，即所谓的“圈地运动”。这个运动的兴起主要是经济原因。在 15 世纪英国市场的羊毛和肉类价格不断上涨，乡绅们算账的结果，觉得用几个牧羊人加上一只牧羊犬就能管一大群羊，比起雇用上百个农业工人从事农业耕作要赚钱得多，于是羊吃人的血腥事件就发生了。不过圈地运动是渐进的，最早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1510 年进入第一个高峰。在光荣革命前的一段时间（1637 年前）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圈地运动。复辟时期则通过议会以法律形式进行，18 世纪再度形成高潮。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佃农境况悲惨，他们被从土地上赶走，

成为无产者。不过圈地只是农民被剥夺的一种方式，此外，还有其他方式。

马克思在谈到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时曾说过：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这一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就是商人资本使小生产者无产化的另一条原始积累的道路，这种模式在英国也很普遍。这是因为随着羊毛生产的兴旺发达，英国毛纺手工业发展起来，加上法兰德斯的工匠们移民到英国，把毛纺技术带给了英国人，并且受到英国王室的奖励，这种工业就普及到了英国的各个村镇，成为当时英国创造财富的主要源泉。在这个原始积累过程，一方面制造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则制造出腰缠万金的商人资本家。英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在《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一书中说：“从他们所占的地位看，就可以想像出他们的重要性。在诺里奇，他们构成一种真正的贵族；他们装出绅士的派头而且佩着剑。他们的商业关系，远及中南美各国、印度和中国。虽然人们称他们为制造家，但他们起初并不是从事于制造而是从事于买卖的商人。”“在这种毛纺工业——旧英国的最重要的工业中，真正的手工工场存在，即处在资本家实际管理之下的大作坊的存在，直到十八世纪末仍然是十分例外的。”^①

上述史实清晰地描绘出商人资本家在剥夺小生产者和积累财富两方面一身二任的重要历史地位。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他们是历史的主角，重商主义的美妙乐章由他们演奏出来也就顺理成

^① 保尔·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47页。

章了。

(二) 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经济的发展

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也是建立民族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时代。像保护关税的主张，在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没有提出来之前是不会摆到议事日程上的，而没有民族国家的建立，保护关税是不可能被实行的。只有实行保护关税，民族经济才有可能加速发展起来。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欧洲主要国家都走过类似的道路，而以英国为最典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需要政治上的统一，有了这个条件，才能由一个强大的中心，靠民族凝聚的力量，用火与剑为资本主义经济杀出一条血路。在英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从中世纪末期的 14 世纪开始，历经英法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都铎王朝、伊丽莎白女王、斯图亚特王朝、1637 年革命、克伦威尔执政、复辟时期、光荣革命等阶段，才最终实现。

英法百年战争以英国失败告终，但是从此英国退出了欧洲大陆，心甘情愿以英伦诸岛为建立民族国家的地盘；玫瑰战争中，两大封建主集团自相残杀同归于尽，清除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最大障碍。都铎王朝的最大功绩是组建了民族国家，把英国推进到可以发展民族经济的起点。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宗教改革的成果得到巩固，海外扩张开始起步，击败了西班牙，挫败了天主教复辟的阴谋，使一个繁荣、统一、昌盛的英格兰出现在大不列颠。斯图亚特王朝早期，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因其我行我素而导致 1637 年革命，虽然此后又经过了这个王朝的复辟，但民族国家和民族经济却以不可逆转的态势确立下来。

宗教改革对民族国家的建立也起着重要作用。其具体表现就是英格兰教会的世俗性继续加强。长期存在的反教皇的民族主义

情绪因百年战争而更趋激烈，因为教廷于1308~1378年迁往法国南部，出任教皇的基本上都是法国人，他们处于依附法国国王的地位，在客观上显然立足于英格兰民族的对立面。所以，自1307年后，在英格兰教会的管理和组织方面教皇的法令遭到英格兰人的坚决抵制并反映为议会颁布的一系列反教皇法令。并最终于1529~1536年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宣布英国教会不再效忠罗马教皇。与罗马教皇脐带的切断，是英格兰成为民族独立国家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又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民族经济渐具雏形，主要的表现除商业资本的繁荣、租地农场的发展以外，是与农业相独立的，以手工业作坊为主体的工业的成熟，以及在此基础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大发展。在此过程带有重商主义印记的政府政策、议会立法、海上争霸、殖民战争、财税制度等国家权力的运作都是重要的催化剂，突显出国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在保护民族工业，促进经济基础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关于英国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对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做过细致的研究，并对英国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如何发挥保护其幼稚工业的作用，做了精彩的描述。他说：“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注：英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威尼斯在玻璃制造技术上（还有许多奢侈品制造业）不得不甘拜下风；波斯对于地毯织造与染色的技术终于不得不告放弃。”他又说：“在乔治一世统治下，英国的政治家们早就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的强大所应停靠的基础是什么。1721年英国议会开幕时，这位国王经内阁授意曾这样说，‘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

没有的’”。这个原则在英国同殖民地以及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英国政府对幼稚工业的保护政策，当时的着眼点主要是争取商业上的优势。在它看来，当两个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必然占有优势，而供应农产品的另一方则居于劣势地位。因此英国禁止输入它自己的作坊、工场也在制造的那一类商品，如印度的棉织品与丝织品。这种禁令是绝对的，毫无伸缩余地的。印度制造的哪怕是一根线，英国人也不许输入。这些制造品物美价廉，但英国不用它，而宁可使用质量较差，代价较大，自己制造的东西。但是它却十分乐意把这些印度产的精美得多的织物在较低廉价格下供应欧洲大陆各国。

对于北美殖民地也应用同一个原则。北美殖民地在工商业方面对宗主国完全处于附庸地位。除了家庭工业与普通手工业外，不允许从事于任何工业。直到1750年，为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制帽厂，还引起英国议会的咆哮，并宣称，在北美任何种工业都是“妨害公众”的，连制铁业也不例外，虽然在那里制铁所需的一切材料都异常丰富，甚至迟到1770年，查坦伯爵看到新英格兰人对工业作初步尝试时，他还大不以为然，当即声明，在殖民地地区就是一只马蹄钉也是不准制造的。

对于殖民地如此，对英国的贸易伙伴也适用同样的原则。英国同对手签订的一切商业条约都有一个倾向，就是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予对方的表面利益仅限于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致力于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如果不能享有低关税，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逃税漏税，组织大规模的非法买卖。

英国同葡萄牙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就是最好的案例。

1703年，著名的英国大使保罗·麦修恩，成功地说服了葡萄牙政府，使它相信，如果英国允许葡萄牙酒类按低于别国所纳

酒税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同时由葡萄牙允许英国毛织品进口时按照 1684 年以前的税率（即 23%）纳税作为交换条件，这样对葡萄牙将大为有利。在葡萄牙方面，看来签订这个条约的主要动机，在国王方面是希望增加关税收入，而贵族方面则希望增加地租收入。英国女王安娜在这个条约里把葡萄牙王称为“她的老朋友与同盟者”。

这一条约缔结以后，过不多久，英国工业品即在葡萄牙市场泛滥，而且很快就看到了葡萄牙毛纺工业迅速、彻底崩溃。而英国在葡萄牙所缴纳的关税，却因为英国在报关单上以多报少的伎俩，而达不到所应缴纳税款的半数。据《英国商人》记载：“禁令取消以后，我们（注：英国）从他们（葡萄牙）那里拿走了那么多的银币，以致在那里剩下的，已经几乎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于是我们把目标转向他们的黄金。”这样的贸易一直继续很久。英国人把葡萄牙人向殖民地取得的贵金属全部运走，其中一大部分运到东印度群岛与中国，然后换成货物运往欧洲出售，换回原料。英国对葡萄牙每年的输出额超过输入额达 100 万镑。这使葡萄牙对英国的外汇兑换率降低 15%，十分不利于葡萄牙。《英国商人》的一位作者在向麦修恩的儿子献辞时说：“我们对葡萄牙贸易中，差额的有利于为我方，为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所不及，我们现在从那个国家输入的硬币已 150 万镑，以前不过 30 万镑。”

在英国同法国的贸易上，情况也同葡萄牙有相似之处。法国由于长期的政治腐败，它的工业与财政状况毫无起色，与英国那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恰成鲜明对比，因此在大革命将发生以前，引起了法国政治家们的效仿心。他们希望建立自由贸易，以此作为补救办法。他们的想法是，如果给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 20%）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英国对这个建议当